

大選後的法國政局

張棟材

壹

法國於六月底舉行大選，一直到七月上旬始將南太平洋海外領地兩席投票進行完畢的最後結果是：戴高樂派保衛共和國聯盟及同派支流之獨立共和黨，在國民議會的四八五議席中一共取得三五八席的絕對多數。雖然在大選投票之前，已由法國民意調查所（I F O P）根據調查資料預告了戴派可穩操勝券（見六月二十二日巴黎晚報），但獲得如此在法蘭西共和國歷史上所罕見的優勢記錄，則是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的；而同時更為人所意料不及者，乃是正當咸認龐畢度於此次大選建功最偉之際，戴高樂却忽然任命了龐畢度內閣的財長墨維爾為新總理另組新閣。

關於龐畢度何以在大選勝利後去職一事，法國輿論界與政壇曾流傳了許多分析與揣測，而且也特別引起國際間的關心與興趣。這些分析與揣測大致可綜合下述兩種恰正相反的解釋：

第一種是將此舉視為戴高樂出於已有意退休而以龐畢度為其未來繼承者的安排。其所持理由是認為戴高樂料定今後法國政局將為面臨通貨膨脹的經濟危機，社會改革的阻力以及日益增長的國民不滿等難關，欲求克服即必須採取嚴峻的行政措施，戴高樂為了顧慮到龐畢度在國民心目中已有的聲望可能為此直接受到損貶，乃使其暫時退出中央政權首揆而轉至議會活動地位。在另一方面，戴高樂更深知戴派政黨組織係完全仰賴其個人權威的維繫力，如一旦戴高樂引退便有空中分解之虞，這也是應該早作部署的，因之，在此時即責令龐畢度專心致力於戴派組織的內部團結工作，以求樹立其僅次於戴

高樂的權威。

這一種看法的有力證據是戴高樂在接受龐畢度辭職的復函中除讚譽龐氏六年總理任內的成就之外，其末段的文句為：「親愛的友人，不論你在何處，我將特別和你保持密切的聯絡。希望你隨時準備着出面負國家將賦予你的任何使命與職務。」這樣明顯的表示，自然可意會為龐已經戴指定為將來繼承者的宣告，所以一時甚至亦會流傳着戴高樂將提議修改憲法以增設副總統一職俾由龐畢度出任之說。

第二種是將此舉視為戴高樂與龐畢度兩人之間已發生對立的不和徵象。據說當五月間學工潮嚴重，反戴高樂勢力氣焰正盛時，龐畢度曾向戴高樂進言請其下野，這一點最足觸怒戴高樂而引起戴對龐的疑忌。另一幾已為公開的事實是，兩人在處理法國動亂後的政策上有許多相左的意見。龐畢度固屬忠實的戴高樂主義者，但就他平日作風論，則並非對戴高樂作無條件地完全盲目追隨。戴派組織內亦有左、右、中間派系之分，龐本人為右派並深獲右派、中間派的壓倒性擁護，而戴高樂却經常受到左派份子的包圍，如戴高樂在此次學、工潮中所倡之「參加」構想，聲稱推行「既非資本主義亦非社會主義的第三道路」之「民主革命」，即係受該左派份子之影響而來。龐畢度對該項「參加」構想抱有異議，他雖贊成工人可分享利潤的方式，但鑑於資方對工人參加企業經營所表示的反感，則主張以漸進的試行來代替急進的強予實現工人參加的體制。戴、龐之間既不能有意見的一致，遂終於產生了墨維爾接替龐畢度的局面。

持這一種看法的都認為龐畢度之去職，事實上是等於被黜。戴高樂所真正矚望的繼承者原即為墨維爾，此次大選勝利使戴高樂減去了後顧之憂，正

可以從容地在預料中的長期安定政權期內，予墨維爾脫穎而出的有利時機。墨維爾之受戴高樂信任可見於墨對人的公開談話：「戴高樂與我一向融洽無間，如有意見不同時，永遠是我要退讓而遵從他的意見，因為總統的政策確是賢明堅決。」（註一）墨維爾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戴高樂主義者。

以最近法國情勢及法國輿論來研判，這第二種分析與揣測是較第一種的正確成分為多。

貳

墨維爾的經歷與其和戴高樂的個人關係是無法分開的。他在第二次大戰中，參加了戴高樂所領導的抗德運動，曾任臨時政府的事務總長，戰後於戴高樂的總理任內被派任駐義大使。當一九五八年戴高樂重執政權時，他從駐西德大使的職位又被戴重用為外交部長，且連任長達十年之久。到了今年五月發生學、工潮後，戴高樂改組龐畢度內閣，他由外長轉任財長。現在看來，戴高樂當時之任命墨維爾為財長，就是基於預見當時法國的最大危機的經濟的判斷，期待於墨維爾表現其長才而為日後使其出任閣揆的伏筆。

墨維爾在十年外長期間，次第實現了戴高樂的脫離北大西洋公約、對俄接近、拒絕英國加盟歐洲共同市場等頑強的外交政策，他這次組閣的主要任務，自亦必然是如何求忠於執行戴高樂的繼頑強的外交政策之後的對內重大改革政策。在法國輿論界，對戴高樂任命墨維爾為總理一舉曾評之為戴高樂政權將進入第三期時代；第一期自一九五八年至六二年之戴布瑞總理時期，為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時代；第二期自一九六二年至六八年之龐畢度總理時期，為完成基本的外交政策時代；第三期在墨維爾總理時期行將為社會構造近代化為目標之內政重點時代。

墨維爾將如何達成這第三期的目標，無疑地要遭遇到甚多的困擾。目前，墨維爾所傾全力以赴的策略是盡一切可能先來挽救岌岌可危的法郎地位，制止國內資金大量外流與物價上漲。墨維爾聲言在十八個月內可恢復法國經濟於此次動亂中所受到的損害，對此已製訂出了週密計劃。（註二）不過，至於應怎樣解決在五月學、工潮期所暴露出的政治機構、社會組織、產業構造上的深刻矛盾，則尚無具體的對策。這些深刻矛盾本來就是五月動亂的爆

發劑，如果依然空讓其存在並再擴大，法國報紙均早已警告稱：「無法防遏其不再重新爆發，這是墨維爾內閣當前最大的憂慮。」

此外，還有比這更複雜更困難的課題在考驗法國的為政者，而且這是戴高樂自己對今日高度發展的工業社會所提出的問題。戴高樂說：「我們必須向青年們的傾訴有所答覆，以實行重現人性均衡的社會改革。最重要的是使人們在身為機械的社會一齒輪情形中，亦能維持人性尊嚴而盡其職責。」（註三）法國「世界報」在戴高樂派獲大選勝利的翌日，亦曾撰論對此發表了引人深思的觀點稱：「這不僅只是法國如此，世界各地都在痛感着神祕地生之苦惱。神們都已死去，現在的人們，必須在絕望地尋求生存理由。單靠汽車、電晶體收音機、電子計算機等等這些順從人意的機械，並不能予人以充分的生存意義。」

戴高樂已以「參加」構想初步鞏固下他的政權，主要是他對法國的人民仍未失領導威望，而能喚起人民大眾對他的新的寄望。但問題是建立所謂共同參加的社會，其內容却不是戴高樂只憑其擅長的權術所能蒙混的。目前法國勞工界都已在先行指責戴高樂的此項「參加」構想是一種圈套；保守的財、經、教界人士更深恐這種施策會招來下崗上的混亂後果，恐怕這也正是難以避免的後果。

參

法國報紙曾評論戴高樂為國民所不滿的原因是由於他强行促使法國實施超過自身所能負荷的政策，抨擊他過於重視無意義可言的金字招牌裝飾，而忽略了政治上何者應屬優先的順序。（註四）這種對戴高樂十年專政的非難，實為針對戴高樂所追求的大國主義而發，真正代表了法國人民大眾的心聲。日本報紙曾對此點以實例述稱外人記者在巴黎的五六月動亂時期，都奇異地詢問法國司機、普通市民等何以法國人尚反對為法國建立了大國榮光的戴高樂，被詢者均答稱：「大國的榮光並不能充飢。」（註五）像這類觀感在法國的確相當普遍地傳播着。

發展獨自的核子武器，便是戴高樂不顧一切客觀形勢條件所追求的大國主義之一環，即在五月動亂後政治經濟危機迫在眉睫之際，也仍照預定計劃

進行，一再重申法國決不改變必須成為核子國家的計劃。果然，入七月後，法國政府先後宣佈了兩項有關核子武器的試驗。

一、在七月二、三兩日分別進行了原子潛艇發射的海對地彈道飛彈及地面上發射的地對地彈道飛彈等兩種長距離彈道飛彈，證明已將其原子武器實戰化。

二、自七月七日起在太平洋法領環礁區舉行一系列的核爆試驗，預定五次至六次，最後則為以濃縮鈾為材料作法國最初的氣彈裝置試爆，用以誇耀法國已列於擁有氣彈國家之林。

在法國自身為挽救經濟危機陸續製訂若干緊急的緊縮政策的關頭，又正

當防止核子擴散條約經聯合國通過受全世界各國支持的時際，法國依然出以挑戰式的一意孤行態度，來進行其發展核子武器的計劃，這可說明戴高樂雖在以「參加」構想號召謀取社會改革，却還是只圖暫時迷惑其國人，仍舊不正視政治上何者應屬優先順序的打算。同時，戴高樂所追求的大國目標，實際上已逐漸在發展核子武器的狂熱中傾向於軍國主義化。去年十二月，戴高樂特別批准了三軍參謀總長艾尤萊在「國防評論」雜誌發表「全方位戰略」論文（按艾尤萊於今年春因飛機失事去世），這就是象徵法國傾向軍國主義化的指標。該論文的要點為：「無人敢於預言法國所受之威脅究將來自何方，因此之故，法國的國防不能單以一個假想敵作為防禦對象。」這個所謂「全方位戰略」實即為核戰略，要求擁有相當量的具有全世界射程的彈道武器：如飛彈潛水艦、洲際飛彈等等。

七月份內法國的兩項有關核子武器試驗，說明了法國的戴高樂政權並未因五月的學工潮動亂而對其發展核子武器計劃有所延擱，法國人民雖在不滿戴高樂強制執行超過法國所能負荷的政策與忽略政治上何者應屬優先的順序，而在迷信大國主義亦即軍國主義的戴高樂看來，發展核子武器第一則是不容稍作修改的。

肆

墨維爾曾被「世界報」形容為：「不是作曲家，但是受衆人注目的演奏家，有時亦可擔任為出色的指揮」。這是他最能符合戴高樂的要求之處。墨維

爾就任總理後的首次亮相演奏，是在本月十七日向國民議會發表的施政演說，其所透露的法國今後動向，如下述諸要點：

一、法國的外交政策仍維持已有者不變，朝向建設歐洲一途努力，可在一年半內達成。通貨問題須在國際的相互關聯中考慮。（意即否定法郎單獨貶值之可能性。）

三、今後法國須在通貨膨脹與失業兩大險途之中間邁進，預算赤字應限定為能由國內經濟活動予以填補之程度。當前必須展開活力與積極之政策，

四、工、農、商業之經濟部門，已在進行改革，惟教育、行政制度，特以地方與中央之關係、企業問題所引起之社會關係，仍未着手，實踐「參加」構想，端賴全有關部門之協力合作。

五、大學之危機已由青年危機予以顯露，此即馬柔（文化部長）氏所稱之文明的危機。盼國會即付討論大學問題，以謀秋季新學期有所興革。這是政府、大學當局與學生、教授的共有責任，特別要考慮照顧到學生的代表權問題。

六、行政機構已嫌過於古老，行政權向地方分散，最關重要。應設法成立一如戴高樂總統所稱之集地方全體與地方議會、經濟組織等代表於一堂共同討論之場所，修改憲法與地方行政組織，甚屬必要。

七、五、六月事件顯示出資、勞雙方關係應採取「參加」方式的必要。

除應準備確立工會權利法案立法化外，在企業內部更應建立資、勞雙方之協商關係，俾從業員明瞭企業經營實況，以提高其與企業進步相結合之意識。墨維爾內閣的新教育部長富爾於七月廿四日在國民議會對改革法國學校教育的發言要點是這樣的：

一、由拿破崙時代中央集權的權威主義觀念所訂立的大學制度，現已不合時宜，須求全民教育之推行。

二、實現教育民主化，保證工農子弟及環境不佳階層子弟均有受高等教育之機會。

三、法國中學教育將廢止文、理科劃分，「參加」構想適用於大學教育制度。

。(按：此指當戰爭期間，大部庫迪人被迫遷往巴格達定居，阿拉伯人則北遷接收庫迪人所撤退之村莊。)

以上各點，實乃基本解決大計，惜未能貫澈，因而巴查茲憤而辭職，影響拉曼阿瑞夫政權非淺。

新政權能否垂之永久，端賴內政之修明；而內政中心，在于庫迪族問題之能否解決，如能將上項十二點計劃重行提出，參酌實行，從此叛亂可望局部中止，則不難逐漸步於平坦之途。

六 今後可能的發展

新政權今後對外關係，無疑的，將以以色列為核心問題。因為伊拉克為實際參加對以色列作戰的阿拉伯國家，現在仍約有六千名陸軍與約軍併肩作戰，歸胡笙國王統一指揮，新政權為了爭取阿拉伯人的同情支持，駐約境伊軍不致遽予撤退，至于開羅方面所傳伊軍將自約旦撤退，其中必另有文章。由於對以色列關係之惡劣，直接間接地影響對英美之關係，尤其對美外交關係，自以阿戰爭中斷後，一時恐難望恢復。對法國外交關係，整個阿拉伯國家均已改變對法仇視態度，轉趨友好，這可能由於戴高樂基本態度之變化，不但停止對以色列飛機與坦克之供應，反而以武器供給伊拉克，並與伊拉克簽訂石油協定，協助伊拉克開發國有石油計劃。新政權爲了爭取外援，自無理由拒絕與法之來往。對意大利外交關係，向來甚爲友好，今（一九六八）年伊拉克政府曾與一家意大利公司簽訂煉糖廠合約，預計一九七〇年完工，每年可煉糖十萬噸，雇用工人一千五百名。兩國如此友好，新政權自將繼續把握。對西德外交關係，早因西德與以色列建交關係而中斷，一時亦不易恢復。對蘇俄外交關係，却極屬微妙。儘管巴克爾新總統有反俄跡象，惟正在與以色列對峙之中，不但軍事上仰賴蘇俄之援助，即經濟建設與資源開發，亦必需依附蘇俄。所以有人說新政權有脫離俄共而走向親西方的趨勢，恐怕希望過奢。不過就西方特別是美國立場而言，應該對此一戰略性重要地區，加以重視，儘量爭取，並非絕對無望。當然關鍵在於以、阿爭能否早日獲得解決。至于新政權與阿拉伯國家關係，由於面臨共同敵人——以色列，處於生死關頭，命運一致，彼此之間，自應攜手合作，同舟共濟。惟阿拉伯國家派

系之爭，並未因此而終止。最明顯的是，伊、敘兩國復興黨派系之鬥爭，愈演愈烈，敘利亞之執政黨——復興黨完全走向極左傾路線，變爲俄共之附庸，實較納塞尤甚；而伊拉克新政權純係復興黨右派，兩派敵對，勢如水火，將來必有一場激烈之鬥爭，孰勝孰敗，關乎其政權之續續。所至堪憂慮者，蘇俄將利用其內部之爭，從中挑撥，坐收漁利。

總之，今日伊拉克局勢，仍在風雨飄搖之中，隨時有傾覆之虞。執其政者，如能辨明眞偽，認清敵友，自可化險爲夷，轉危爲安，庶幾不致爲共黨所擊敗！

五十七年七月廿六日

——上接第25頁——

以上由墨維爾、富爾兩人發表的法國政治改革原則，已間接地描出了戴高樂的「參加」構想的粗略輪廓。不過，今天的法國內部問題關鍵在繫於大學生的動靜上，他們有組織背景，這並不是什麼溫和的一紙大學改革方案所能解決的，更何況連這種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呢？五、六月動亂事件是由大學生一手造成，其後雖在大選期間經法政府大力鎮壓而在表面上趨於平靜，但其組織活動則並未停止，如在巴黎等五市成立「人民暑期大學」，聲稱繼續「五月革命運動」講習（註六），七月十三日深夜在巴黎拉丁區又有學、警大混戰（註七）等，即其例證。只要這種不安因素始終潛在，戴高樂政權從大選勝利中得來的所謂安定政權，還是不足恃的。

（註一）見日本「世界週報」七月廿三日號第十一頁。

（註二）見七月十八日墨維爾對日外長三木武夫談話。

（註三）見戴高樂六月二十九日電視廣播演說。

（註四）見法國「世界報」七月二日社論。

（註五）見六月五日日本「每日新聞」巴黎通訊。

（註六）見七月五日法新社巴黎電。

（註七）見日本「每日新聞」七月十四日巴黎通訊。